

# 三十余年来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刘 斐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83)

**提 要** 上世纪60年代末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创立了互文性理论,80年代起这一理论被逐渐译介入中国。我们将三十余年来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属于早期译介期;第二阶段为上世纪90年代,属于系统引介期;第三阶段为本世纪以来的逐步繁荣期。在此基础上,我们梳理了三十年中西互文关系研究,指出中西互文存在着广阔的对话空间。

**关键词** 互文性 克里斯蒂娃 综述

自 1966 年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词语、对话和小说》(*Word, Dialogue and novel*)中使用“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这一术语,至今将近五十年。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互文性理论被引入我国,至今也有三十余年。回顾互文性理论三十余年来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对于当下互文性理论的研究不无裨益。我们按时代顺序,大致将互文性理论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世纪 80 年代,属于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在于互文性理论几乎均以译文、译著的形式引入中国,较为缺乏系统研究互文性理论的论著。第二阶段为上世纪 90 年代,属于互文性理论的系统引介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在于出现多篇全面引介、研究互文性理论的论文,且出现了以章节形式专门介绍克里斯蒂娃以及互文性理论的著作。第三阶段是本世纪开始至今,属于互文性理论的逐步繁荣期。关于互文性理论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变迁,也可以从互文性理论研究论文的数量变化中得到印证。我们在中国知网期刊库中搜索篇名中含有“互文性”的论文,结果显示共有 1016 篇。在这 1016 篇论文中,80 年代为 0 篇,90 年代共 14 篇,而进入本世纪后则呈现出显著增长的态势,具体数据如下表 1 所示:

年份	80 年代	90 年代	2000-2004	2005-2006	2007-2008	2009-2010	2011-2012	合计
论文数	0	14	70	110	196	260	366	1016
比例	0	1.38%	6.89%	10.83%	19.29%	25.59%	33.02%	100%

表 1:以“互文性”为题的论文统计

\* 本论文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二届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团队支持,项目号:QJTD13WCX01。

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调查仅仅属于抽样调查,如果搜索篇名中含有“互文”的论文,则显示的论文总数为 1584 篇(其中包含若干研究中国传统互文的论文),此外也并非所有互文性理论研究论文均在篇名中冠以“互文性”,可见仅仅是抽样调查已足见互文性理论呈现出的燎原之势。由于学界对于我国八九十年代的互文性理论的研究情况缺乏关注,而进入本世纪以来,互文性理论研究逐渐呈“井喷”状态,相关论文著作不胜枚举,故而我们对于八九十年代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详加整理,而对于本世纪以来的互文性理论研究情况则主要从研究脉络上加以梳理。

## 一、80 年代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早期译介期)

虽然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Julia Kristeva 就已提出“互文性”这一概念,但据我们研究,我国学界直到 80 年代才对互文性理论有所了解。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论著有张隆溪的《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张寅德翻译的《文本理论》(罗兰·巴特著)及《文学原理引论》(特里·伊格尔顿著)的两个中译本。

张隆溪是国内较早介绍克里斯蒂娃及互文性理论的学者。张隆溪在 1982 年第 12 期《读书》发表的《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一文,对克里斯蒂娃及其互文性理论已有较为深入的认识。该文视雅克·德里达为“后结构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介绍了德里达的符号学思想:“德里达把符号理解为印迹(trace),因为符号总是在与别的符号相对立和比较中显出意义,别的符号也就有助于界定它的意义,在它上面留下它们的印迹。”德里达的符号学思想实际上受到了互文性理论的影响。张文指出:

由于一篇作品里的符号与未在作品里出现的其他符号相关联,所以任何作品的本文育与别的本文互相交织,或者如朱丽娅·克利斯蒂瓦所说:“任何作品的本文育是象许多引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育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

克氏的上述话语出自克氏 1976 年出版的《符义分析探索集》(或译《符号学:语义分析研究》, *Sémio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一书,这是“互文性”的经典定义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此外张隆溪对罗兰·巴特的广义互文性思想也有深入了解:

没有任何本文是真正独创的,所有的本文(text)育必然是“互文”(intertext)。“互文性”最终要说明的是:文学作品的意义总是超出本文范围,不断变动游在……后结构主义者否认任何内在结构或中心,认为作品本文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并无终极的意义,就象巴尔特所说那样,文学作品就象一颗葱头,“是许多层(或层次、系统)构成,里边到头来并没有心。”

上述观点多数源自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该文作为广义互文性理论的理论宣言在互文性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隆溪在文中还探讨了西方互文性理论与中国诗文“用典”之间的联系(详见余论部分)。

1987 年《上海文论》第 5 期发表的由张寅德翻译的罗兰·巴特《文本理论》,该文是罗兰·巴特给法国一九八五年版《通用大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撰写的词条,巴特在文中向法国学界热情介绍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该文(1987:91-92)开头即提出:

文本的定义主要是由朱丽雅·克利斯特娃出于认识论的目的加以拟定的:“我们将文本确定为一种超语言学的机器。它为一种以直接信息为目的的交联话语与各种先时或共时的语句建立联系,以此对语言的范畴进行重新分布。”隐存在这一定义话中的主

要理论概念育出自朱丽雅·克利斯特娃:意义活动、生产力、意义生成过程、现象型文本、基因型文本以及互文性。

巴特在文中解释到“互文”词条时说:“(互文是)文本重新分布(它是这种重新分布的场)。……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张寅德在《文本理论》“译者按”(1987:91)中高度肯定了该文的理论贡献,认为“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并特别指出:“这篇文章虽然借用法国分析符号学家克利斯特娃创立的概念,然而它却是巴特本人后期文学理论的反映。”罗兰·巴特是克利斯特娃的老师,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和克利斯特娃共同创立了互文性理论。罗兰·巴特不仅在《文本理论》中系统介绍了互文性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提出了“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等广义互文性理论宣言。正是通过该文巴特让互文性理论获得了当时法国学界的认可,故这篇在互文性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全文被翻译为中文,极大地推动了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此外,1987年英国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文学原理引论》的中译本由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编译。伊格尔顿是当代西方著名文学理论家。该书梳理了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的主要文学批评理论,第三章“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裘小龙、杨自伍翻译)注意到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和复调理论:

语言应视为本质上是“对话性的”……词语在意义上是“有着‘多种重读音的’”而非一成不变:它们总是一个特定的人的主体对于另一个人的主体发出的词语,这种实践场合会影响和改变词语的意义。

我们知道,克利斯特娃的互文性理论直接脱胎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复调理论,故而该书对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复调理论的引介对于互文性理论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该书第五章《精神分析学》(赵兴国翻译)注意到“克利斯特瓦的思想受到拉康的影响很大”,特别分析了克氏1974年出版的解析符号学代表作《诗歌语言的革命》,认为“她反对的是象征,而不是想象(她称之为符号学)。她所指的是我们可以在语言内部找到一种结构或力的作用,它代表着先俄狄浦斯阶段的一种残余”。该书还深刻剖析了克氏解析符号学的实质:“克利斯特瓦指望用符号学这种‘语言’作为破坏象征性秩序基础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参考文献中有三部克氏著作:《*About Chinese Women*》(《中国妇女》)(1977)、《*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诗歌语言的革命》)(1974)、《*Desire in Language*》(《语言的欲望》)(1980)。此外还包括狭义互文性理论代表人物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的《*Narrative Discourse*》(《叙事话语》)(1980)以及广义互文性代表人物罗兰·巴特的《*Writing Degree Zero*》(《写作的零度》)(1967)、《*S/Z*》(1975)及《*The Pleasure of the Text*》(《文本的愉悦》)(1976)。1988年王逢振也翻译了特里·伊格尔顿的这部著作,将书名译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李幼蒸翻译的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一书,该书收录了克氏的《人怎样对文学说话》一文。李幼蒸在“译者前言”(1988:1)中解释道:“当时巴特的结构主义思想正在(包括克利斯特娃在内的)所谓‘后结构主义’影响下开始转变。克利斯特娃这篇长论更能从哲学和文学理论角度阐释巴特的写作观。”此外1988年汪耀进、武佩荣翻译的罗兰·巴特的解构主义名著《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明显受到了互文性理论的影响,也推动了互文性理论在我国的传播。

1989年张来民在《河南大学学报》第二期发表《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信息金山”》一文,对挪威女权主义研究者特丽尔·莫伊写的《性/文本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一书加以评述。该书系统介绍了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并以整章的篇幅介绍了克里斯蒂娃的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张文认为“对女权主义来说,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边缘性理论和异性质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可以破坏传统语言学的中心结构。”“克里斯蒂娃认为必须抛弃索绪尔 Langue(语言)概念,把‘讲话’主体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重新加以建构。……克里斯蒂娃认为就语言性差异研究来说,任何对文学中孤立的断片(句子)的分析,无论如何都将证明不能得出特定的结论。”这些论述中都可以看到互文性理论的影子。

总体而言,上世纪80年代只能算是互文性理论译介的初期,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互文性理论主要是伴随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被介绍到中国的,且互文性理论几乎均以译文、译著的形式引入中国。这一时期尚未出现对西方互文性理论的系统译介,对西方互文性理论创立者克里斯蒂娃也缺乏专门研究。

## 二、90年代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系统引介期)

九十年代属于互文性理论的系统引介期,其显著的特点在于出现了全面介绍互文性理论的若干重要论文。其中以殷企平(1994)、程锡麟(1996)、黄念然(1999)和史忠义(1999)为代表。

殷企平《谈“互文性”》一文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该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试图从作家、读者和批评家等不同角度来全面解读互文性理论。该文认为从作家的角度看,互文性表现为“对文本的改写”;从读者的角度看,互文性又表现为“文本的完成”,且认识到“任何文本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地完成”;从批评家的角度看,互文性则表现为“文本的阐释”。此外,该文认为互文性的“最大功能恐怕是对传统的权威式批评的消解。”

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发表于《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该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广义互文和狭义互文这两个角度来梳理互文理论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较早提出克里斯蒂娃创立互文性理论受到了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小说”、“文学的狂欢节化”等概念的启发。在广义互文性理论发展方面,程氏注意到德里达的文本理论:“每一个文本,每一种话语,都是能指的‘交织物’(interweaving)或‘纺织品’(textile),这些能指的所指是由其它话语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确定的。”该文对德里达的“延异(differance)理论”也予以了关注,在符号中由于“‘延异’的游戏”导致“互文性这一概念成了一种无限的指号过程(semiosis)的深渊。”此外,该文对狭义互文理论代表里法泰尔的阅读理论、热奈特的五种跨文性(transtextuality)也加以了介绍。

黄念然《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值得一提的是,该文在探讨广义互文性理论时注意到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的意指作用理论,艾柯是从文本意指作用的无限开放性的角度对文本的“互文性”加以研究的。在探讨狭义互文性理论时则介绍了法国符号学家米歇尔·里费特尔和美国结构主义诗学代表人物乔纳森·卡勒的互文性思想。在米歇尔·里费特尔看来,“一切互文性关系都必须置于每一个文本的结构母体之上,即文本和它的互文本是同一结构母体(matrix)的变体。”而乔纳森·卡勒则提出把文本当文学来阅读,认为必须以五种文本作为参照。该文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介绍了以哈罗德·布鲁姆(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理论)为代表的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中的互文性思想,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不存在任何原文,一切文本处于相互影响、转换、交叉重叠之中,影响关系支配着阅读,而阅读不过是误读而已。”此外该文介绍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互文性

思想。新历史主义认为“文本是历史性的,历史是文本性的”。而女性主义批评中,妇女写作被视为“双文本”的过程。该文创新之处还在于从共时、历时层面探索互文性理论,认为“从共时性角度探讨互文性的多为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从历时性角度出发的主要体现在新历史主义与女性主义之中。”

史忠义《“文本即生产力”:克里斯特瓦文本思想初探》是这一时期对克氏文本思想总结最为全面、精当的论文,该文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4期。该文围绕克氏在《符号解析,符号解析探索集》(1969)和《小说文本》(1970)中提出的“文本是一种生产力”这一命题,阐释并分析了这一命题下的众多概念(如“生产”、“现象文本”和“生殖文本”、“生殖活动”、“抽象数”、“表意微分”和“表意组”等)。史忠义认为克氏关于文本的定义有以下要点:文本是一种生产程序;文本通过对语言持续不断地破坏和重建而重新分配语言内部的类型关系;文本间性是文本的突出特点;文本的生产活动是一种语言的意义生殖活动;对文本的解读更应采用逻辑手段和数学手段。文中特别对克氏提出“表意手段”(le travail du signifiant)与拉康提出的“表意链条”(chaîne signifiant)予以了区分,认为拉康“以表意链条取代言语定义,旨在重新界定主体及其对象的结构,填补表意链条这一大单位内部的空白”,而“克里斯特瓦的文本论思想已经使主体‘雾化’”,对于克氏而言表意手段“是一个能动的、活跃的程序,其间,意义的生殖单位产生、发展、解体、再产生,以至无穷”,指出拉康关注说话主体的结构(structure du sujet parlant),而克里斯特瓦则关注文本的生殖过程(germination du texte)。在总体检视批评的基础上,史忠义认为克氏创立的文本理论中的众多概念“其目的在于强调表意手段即语形和语音的变化性和发展性”。

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是1992年姚劲超、姜向群、戴宏国翻译的克氏女性主义代表作《爱情传奇》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这是克氏著作首次被翻译成中文。

二是西方互文性理论的直接来源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复调理论。1998年由钱中文主编的六卷本《巴赫金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巴赫金全集》的出版有助于国内学界全面了解互文性理论的理论背景和渊源。此外,西方其余互文性理论大师的著作开始被译介到中国。如提出了五种跨文本关系的狭义互文性理论的代表人物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于1990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助于国内多角度了解西方互文性理论的发展脉络。

三是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系统介绍克里斯蒂娃及互文性理论的论著。1992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林建法、赵拓译)一书。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第八章《边际与颠覆:朱莉娅·克莉斯蒂娃》以一章的篇幅介绍了克里斯蒂娃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同年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程巍翻译的克里斯蒂娃《妇女的时间》一文,这是克氏关于女性主义最重要的论著之一。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该书第四编《文化符号学》的第二部分“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专设一小节(“3.3 克莉思特娃的符号学理论”)系统介绍克氏的符号学理论。该书详细介绍了克氏的意指实践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文化批判实践。认为克氏的评论理论实际上受到阿尔杜塞结构派马克思主义、拉康精神分析、德里达解构论、巴特文化意义批评以及福柯的权力结构批评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是国内较早注意到克氏1974年的访华之行的论著。克氏1974年应邀访华,回国后写成了《中国妇女》在

西方引起轰动。

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该书第十五章《解构主义》第二节“解构与结构”(431-432页)中提出:“解构主义是倡导互文(intertext),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等最有力的学派”。分析了解构批评中“互文”的四种含义。该书第四节“互文性”认为克氏的互文性既包括文本之间空间上的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ship)与时间上的聚合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ship)。该书的特点在于从解构主义角度来研究互文性理论(442-443页),认为“解构批评要求批评家在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之中展示互文性。”“解构批评家心中至少需要存有‘双重解读’、‘双重批评’,才能呈现出互文性。”并分析了巴特《S/Z》这一标准的具有“互文性景观”之作。

总体而言 90年代属于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系统引介期。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全面引介、研究互文性理论的论文,出现了以章节形式专门介绍克氏以及互文性理论的著作,此外克氏及其他互文性理论家的著作也首次译成中文,有力促进了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 三、本世纪以来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逐步繁荣期)

我们之所以将 21 世纪以来的互文研究称为逐步繁荣期,是基于以下判断:

一是大批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的著作及国外互文性研究著作被翻译成中文。

作为西方互文性理论的创始人克里斯蒂娃的著作被大量翻译成中文,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之一。2001年由张新木译的克氏著作《恐怖的权力·论卑贱》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而后如《汉娜·阿伦特》(刘成富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反抗的未来》(黄晞耘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反抗的意义与非意义》(林晓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中国妇女》(赵靓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等等。克氏著作的大量译介,有助于国内学界加深对克里斯蒂娃的了解。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以往克氏译著中主要侧重于克氏关于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的论著,而克氏关于语言学特别是关于互文性的理论的译著则鲜有译文。祝克懿、宋姝锦(2012)将克氏首次提出互文性理论的《词语,对话和小说》全文译成中文,使得国内得以首次全面了解“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概念提出的背景和完整语境,有力推动了国内互文性研究的发展。

作为西方互文性理论奠基人的罗兰·巴特的关于互文性理论的著作这一时期也大量介绍进中国,如屠友祥翻译的《S/Z》、《文之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 2000 年、2002 年出版,李幼蒸翻译的《符号学历险》也于 2008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热奈特的互文性论著也被译介成中文,如 2001 年史忠义翻译的《热奈特论文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里面收录了《广义文本之导论》及《隐迹稿本》等在互文性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论著。

此外,外国研究互文性理论专著的翻译也是这一时期的成果体现。2003 年邵伟翻译的法国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日本学者西川直子著《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由王青、陈虎译出,于 2002 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两部著作都有助于国内学界全面掌握互文性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

二是国内开始出现研究克里斯蒂娃的专著及互文理论译介性专著。

2002 年台北生智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罗婷的《克里斯多娃》一书,该书是国内首部介绍克氏的专著。2004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罗婷的《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该书对克氏关于符号学、互文性理论、女性主义诗学、精神分析法等领域的理论予以了较为全面的介绍。2005 年王瑾出版的《互文性》则是国内首部介绍西方互文性理论的专著。徐赳赳《现代汉语篇

章语言学》一书在第五章《篇章现象》中专设一节“互文”(2010:240-262),全面总结了互文性理论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状况。

三是出现一批以互文性理论为选题的博士论文。

如李玉平《互文性研究》(2003)、刘金明《互文性的语篇语言学研究》(2006)、焦亚东《钱钟书文学批评的互文性特征研究》(2006)、万书辉《文化文本的互文性书写:齐泽克对拉康理论的解释》(2007)陈亚萍《体裁互文性研究》(2008)、孙秀丽《克里斯蒂娃解析符号学研究》(2010)等。此外,以互文性理论为选题的硕士论文更是不胜枚举。

四是涌现出以罗婷,秦海鹰、史忠义,辛斌、祝克懿为代表的三条互文理论研究脉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进入 21 世纪,国内的互文性研究大致沿着三条线索向前推进:

第一条线索是以克氏研究为主,在介绍克氏理论的大语境下介绍互文性理论。这一方面以罗婷为代表,她于 2002 年完成博士论文《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出版了国内首部克氏研究专著《克里斯多娃》(2002),还发表了克氏研究的系列论文,如《论克里斯多娃的互文性理论》(2001)、《边缘与颠覆:克里斯特瓦的女性主义诗学》(2001)、《克里斯特瓦的符号学理论探析》(2002)、《论克里斯特瓦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2002)、《克里斯特瓦的理论背景与诗学思想》(2003)、《克里斯特瓦的纳克索斯/自恋新诠释及文学隐喻》(2005)等。大致而言,罗婷的研究紧紧围绕克氏研究这一主线,以此蔓延至克氏相关理论的介绍,对于克氏的深入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互文性理论的发展。此外孙秀丽的《克里斯蒂娃解析符号学研究》(2010)是国内以克氏研究为专题的又一部博士论文,深入剖析了克氏的解析符号学理论。

第二条线索是以互文性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为主线,这一方面以秦海鹰和史忠义为代表。秦海鹰于 2000 年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互文性问题研究》,并发表系列论文:《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2004)、《人与文,话语与文本——克里斯特瓦互文性理论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联系与区别》(2004)、《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具体应用》(2006)、《罗兰·巴尔特的互文观》(2008)、《从结构分析到文本分析——追寻罗兰·巴尔特批评方法的演变轨迹》(2008)。大致而言,秦海鹰的研究都围绕着互文性理论研究这一主线,故而由克氏扩展为对巴赫金、罗兰·巴尔特等其他互文性理论家的研究,不仅关注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也对其演变予以了关注,使得国内学界对于互文性理论的演变脉络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史忠义是这一方面的又一代表人物,我们在前文已指出他的《“文本即生产力”:克里斯特瓦文本思想初探》(1999)一文堪称九十年代对于克氏文本思想研究最为深刻的论著。2000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他的《20 世纪法国小说诗学》一书,对克氏有关文本对话论、转换论以及互文性理论均作了深入阐述。2001 年他翻译的《热奈特论文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热奈特是狭义互文性理论的代表人物,该集中译本的出版有力推动了国内互文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此外 2009 年他又翻译了堪称广义互文性理论宣言的罗兰·巴尔特的《文本理论》。总体而言史忠义对于互文性理论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克氏,对于克氏的研究也并不局限于其互文性理论,而是从克氏整个文本思想的角度对互文性理论加以辩证地评析。

第三条线索是将互文性理论引入具体语篇分析,并致力于互文性理论的中国化。这方面以辛斌和祝克懿为代表。辛斌以互文性理论为理论武器,探索其在语篇研究中的价值。他在《体裁互文性与主体位置的语用分析》(2001)中发展了互文理论,将互文区分为“体裁性互文”与“具体性互文”。此外还发表了《语篇互文性的语用分析》(2000)、《互文性、非稳定意义和稳

定意义》(2006)、《语篇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2008)、《引语研究的语用修辞视角》(2010)、《语篇互文性分析的理论与方法》(2010),对于确立互文理论在语篇分析中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祝克懿则将西方互文性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倡导“互文语篇理论”研究,提出了互文语篇结构的三个认知维度(宏观认知维度、动态认知维度与多元认知维度)以及三大理论支柱(系统功能理论、函数关系理论与空间层级理论)。她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文视野中的语篇结构研究》并发表了系列论文:《超文本的传播功能与发展空间构想》(2007)、《20世纪社会政治关键词“革命”的互文语义考论》(2010)、《互文:语篇研究的新论域》(2010)、《元语篇与文学评论语篇的互动关系研究》(2011)、《克里斯蒂娃与互文语篇理论》(2012)。此外主持了《当代修辞学》中的“互文与修辞”专栏与“西方文本理论名篇选译”专栏,有力推动了互文性理论的中国化。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7月26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刊登了《多声部的人——与克里斯蒂的对话录》记叙了克里斯蒂娃在复旦讲学期间与祝克懿的对话。克里斯蒂娃在《对话录》中提出“人是多声部的”这一重要论断,这是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理论的最新发展。

复旦大学在推动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九十年代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就在《现代西方美学史》(1993)中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互文性理论,此外朱立元所著《当代西方文艺理论》(1997:350-352)的“法国派女权主义批评”部分,也专门介绍了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刘大为、祝克懿教授还指导学生完成了多篇互文性理论的硕博学位论文,如范昕《互文视野下的“张腔”语言风格研究》(2009)、储丹丹《文史类学术论文摘要语篇的互文分析》(2010)、管志斌《语篇互文形式研究》(2012)、刘斐《中国传统互文研究》(2012)、宋姝锦《文本关键词的语篇功能研究》(2013)等。此外,复旦大学主办的《当代修辞学》分别于2010年及2012年开辟了“互文与修辞”专栏与“西方文本理论名篇选译”专栏,已相继发表12篇论文。2012年11月4日至13日,克里斯蒂娃接受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邀请访华,并得到了复旦大学人文基金“光华杰出人文学者”讲座项目的支持。克里斯蒂娃教授在复旦大学发表了四场演讲,“互文”就是演讲的主题。其间,克氏受聘为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当代修辞学》学术顾问,为推动互文性理论在语言学界的纵深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同时,《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读本》译丛也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丛书收录了克里斯蒂娃教授的三部著述:《符义分析探索集》、《未知的语言世界》、《克里斯蒂娃自选集》。

#### 四、余论:三十年来中西互文关系研究

关于中西互文之间究竟关系如何,不少学者认为二者仅仅是译名上的巧合,二者几无对话空间。实际上早在80年代,张隆溪在《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1982)中已对中西互文之间可能的对话展开了探讨:

中国诗文讲究用典,于于把前人辞句和文意嵌进自己作品里,使之化为新作的一部分,这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所谓“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的概念。但“互文性”不仅指明显借用前人辞句和典故,而且指构成本文的每个语言符号育与本文之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在形成差异时显出自己的价值。

张隆溪敏锐地察觉到中国诗文中的“用典”实际上就是互文的一种形式,并认为西方互文性理论的内涵要大于中国传统的“用典”。

妨碍中西互文对话的主要有以下误解:其一,将类型宏富的传统互文仅仅等同于互文辞



格;其二,认为传统互文仅存在于文本内;其三,将传统互文视为封闭、自足的系统。实际上早在70年代,钱钟书《管锥编》(1979:27)在分析《礼记·坊记》:“君子约言,小人先言。”时已经敏锐察觉到其中蕴含的推理互文,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1993:268-270)则在此基础上从语义补充角度对互文现象予以更为细致的形式化分类,将互文分为六类。推理性互文的发现,打破了传统互文结构的自足系统,为中西互文的对话创造了条件。

进入本世纪,中西互文之间的关系日益成立学界较为关注的话题。夏腊初《西方文论的“互文”与汉语修辞的“互文”》(2005)认为中西互文的联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两者都应具备语言学的修辞特点”,“二者皆具备诗学意义”,“思维模式的相似”。甘莅豪《中西互文概念的理论渊源与整合》(2006)认为“(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互文’)和西方互文各看到了一部分,前者看到词、短语、句层面的互文,后者看到了篇章文本层面的互文,两者之间遥相呼应,彼此‘互文’,彼此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主张中西互文的关注对象互补,存在整合的可能性。杨颖育《互文性与中国诗学的“互识、互证、互补”》(2010)认为互文性理论与中国诗学互文修辞的“内在诗学精神是相通的”,并从“意义生成方式”、“言语生成方式”、“话语阐释方式”三方面阐述互文性理论与中国诗学的“互识、互证、互补”。马国彦《元话语标记与文本自互文——互文视角中的篇章结构》(2010)认为“intertextuality”被译为“互文”反映了“东西方在认知语言现象时思维上的暗合:文与文之间是一种差异性的叠合,是一种互涉互补的关系。”祝克懿《互文:语篇研究的新论域》(2010)指出传统互文“本质上是一种构成成分共享的互蕴结构互文,互为存在前提的互动结构互文,而西方的文本互文强调的也是其互涉互动的结构理念,关注的是多向度交互文本结构的生成。”主张“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实际上是“中西互文结构的理念核心”。

实际上,传世文献中用“互文”指称的语言现象并不等同于互文修辞格。古人往往用“互文”来概括互文项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传统互文包括极为宏富的类型。我们在《“互文”考论》(2011)中从“语义互动”和“形式互动”的角度,将传统互文区分为“语义互动类互文”、“形式互动类互文”以及“语义-形式互动类互文”3大类10小类互文,指出传统互文中的众多类型都可与西方互文理论展开直接的理论对话。此外,我们在《中国传统互文研究——兼论中西互文的对话》(2012)中通过对传统互文的互动类型、认知机制、层级及标记等研究,试图建构传统互文理论以期实现中西互文的对话,总结出了传统互文认知机制的两大原则:“相似即互文”(包括“相同即互文”及“相类即互文”)与“互补即互文”(包括“形式互补即互文”及“语义互补即互文”,并分析了传统互文中的“文”的内涵、层级与标记,指出中国古人与西方互文性理论对于“文”的理解都具有强烈的互涉观,且中西互文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跨文本互文及副文本互文),故而存在广阔的对话空间。我们比较了中西互文的认知机制,指出西方互文的认知机制可以概括为“嵌入即互文”,具体表现为“形式嵌入即互文”与“联想嵌入即互文”。我国传统互文中也存在因为形式嵌入而造成的互文,而传统互文认知机制的两大原则实际是联想嵌入原则的具体表现。

2012年克里斯蒂娃教授在复旦讲学期间,我们曾向她介绍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文”的理解,当向她介绍到《易·系辞》有“物相杂故曰文”的观念时,教授惊奇地表示中国古代对于文本的理解极具开放性,已经形成理论体系,相比较而言,西方古代对于文本的理解还没有上升到“物相杂故曰文”的理论总结的高度。至于中西互文对话的可能性,教授则肯定地回答道中国古代存在大量互文现象。

互文性理论从八十年代初步引入中国至今已有三十余年,我们对这三十余年来历程的回顾仅仅是一孔之见,特别是对于新世纪以来互文性理论的新进展难免挂一漏万。然而三十年来,互文性理论从八十年代零星的译介到如今逐步走向繁荣,互文性理论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队伍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将互文性理论与汉语语篇实际相结合,如何建构具有中国气象的互文性理论,可能是摆在研究者面前值得思考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张隆溪 1982 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信[J].《读书》第12期.
- 胡范铸 1993 《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朱立元 1993 《现代西方直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史忠义 1999 “文本即生产力”:克里斯特瓦文本思想批探[J].《外国文学研究》第4期.
- 辛斌 2001 体裁互文性与主体位置的语用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
- 罗婷 2004 《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M].想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秦海鹰 2004 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信论》第3期.
- 甘莅豪 2006 中西互文互文概念的理论渊源与整合[J].《修辞学习》第5期.
- 祝克懿 2010 互文:语篇研究的新论域[J].《当代修辞学》第5期.
-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2012 词语,对话和小说[J].祝克懿、宋为锦译,黄蓓校,《当代修辞学》第4期.
- 刘斐 2012 中国丽统互文研究——兼论中西互文的对话[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蒂费纳·萨莫瓦约 2003 《互文性研究》[M].邵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巴赫金 1998 《巴赫金全念》[M].钱中文主编,影家响:河想教育出版社.
- 程思麟 1996 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第1期.
- 黄念然 1999 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J].《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
- 克里斯蒂娃 1992 《爱情丽奇》[M].姚劲超、姜向群、戴义国译,想京:华夏出版社.
- 李幼蒸 1993 《理论符号学导论》[M].想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罗兰·巴特 1987 文本理论[J].张寅德译,《上海文论》第5期.
- 罗兰·巴特 1988 《符号学这理》[M].李幼蒸译,想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罗兰·巴特 1988 《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M].汪耀进、域佩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孙秀丽 2010 克里斯蒂娃解析符号学研究[D].东想师范大学.
- 特里·伊格尔顿 1987 《文学这理引论》[M].刘峰译,想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王瑾 2005 互文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西川直子 2002 《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M].王青、陈虎译,影家响:河想教育出版社.
- 徐赓赓 2010 现代汉语篇章语言学[M].想京:商译部书而.
- 殷企平 1994 谈“互文性”[J].《外国文学信论》第2期.
- 张来民 1989 西方女权主义批信的“信息金山”[J].《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
- 张首映 1999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想京:想京大学出版社.